


# 贵州安龙新出铜器

## ——兼论贵州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李 飞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从分析安龙新出青铜器出发，本文大致梳理了贵州西南地区历年出土的青铜器，在与周邻材料对比后提出，战国至西汉时期，存在一个以贵州西南为中心，包括桂西北、滇东南部分地区在内的一个以 V 形釜、风字形钺身、部分带“”符号的铜钺为典型器的文化圈，可以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暂称之为铜鼓山类遗存。这类遗存与黔西北地区的同期遗存间存有联系，但差异也是明显的。

关键词：贵州西南；青铜文化；铜鼓山类遗存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3-0062-08

2008 年 7 月 7 日，安龙县西城区施工过程中发现 8 件青铜器，计有釜、洗、盆、钺和羊角钮钟等，其中含 2 件带铭文的朱提堂狼铜器。出土地点可能为一处铜器窖藏。贵州西南地区历史上屡有青铜器出土，据不完全统计已逾百件。过去一般将之与贵州西北部的同期遗存一道，认为系夜郎遗存。而从现有材料看，贵州西南与西北部的青铜文化之间是存有差异的。兹就相关问题简论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 一、埋藏环境与性质

文物出土地点在县城西南约 5 公里处，行政区划属新安镇大坪村上大坪组，小地名文家屋基。地理坐标在北纬 25°05′52.6″、东经 105°26′03″附近，海拔 1360 米。该地与县城连为一体，系一开阔的山间盆地。早先为农田，周围有民居。2007 年起在此修建安置大道以置西城区建设的拆迁户。大道路基现已基本掘就，中央深陷，两侧堆放浮土，有当地村民在两侧隆起的土堆上栽种包谷。2008 年 6 月，开始用挖掘机拓宽部分路基。文物出土地点因紧临一株高压电杆，挖掘作业最后进行，因而也延迟了文物发现的时间。

据负责挖掘机作业的工人回忆，铜洗、铜釜等器物直接被挖掘机掘出，铜钺、羊角钮钟等尚直立于原地，其指认的出土位置距地表深约 1.1

米。器物大致呈一线排开，彼此相距最远约 2 米。

经仔细查看，文物出土地点现存堆积可分三层：第一层为耕土层，厚 80 厘米。又可细分为 A、B 两层，A 层是掘路后堆砌在道路两侧的浮土，被当地村民略夷平后于其上栽种包谷而形成的耕土层；B 层系修路前栽种水稻的耕土层。第二层为青灰色胶泥，厚 0~50 厘米。仅局部分布，在残留的断面上呈圆底坑状，宽 150、深 50 厘米。土质土色均较纯，未见炭屑、烧土等包含物。文物可能出在该堆积中。因紧邻电杆，公路在此将不再拓宽，我们亦未对该堆积作进一步清理。第三层为浅黄色胶泥，间杂有带状黑色泥炭。此层应为生土。另据施工者指认，我们查看了倾倒在附近的据说从铜洗中倒出的泥土，系青灰色胶泥和浅黄色胶泥相混的杂土。

现场破坏较为严重，又未发现墓葬或遗址的迹象，该地早先也无同期墓葬的线索，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处铜器窖藏遗存。其埋藏的时间尚无法推定，可能与最晚文物的年代相当，也可能远晚于文物的年代。为何瘞埋此处亦不得而知。

### 二、器物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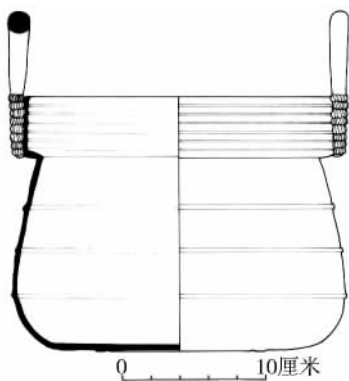
8 件青铜器中含釜 1 件、洗 2 件、盆 1 件、钺 3 件、羊角钮钟 1 件。



图一 安龙新出青铜器

- 1.“延光元季朱提作”铜釜(08AX:1) 2.“延熹四季朱提堂狼造”铜洗(08AX:2) 3.铜洗(08AX:3) 4.铜盆(08AX:4)  
5.铜钲(08AX:5~7) 6.羊角钮钟(08AX:8)

铜釜,1件(暂编号08AX:1,图一,1;图一,1-1)。敞口、直沿、颈微束、弧腹近直、平底。沿上竖直附二立耳,高出釜沿5.8厘米。



图一,1-1 (08AX:1)

沿外侧饰凸弦纹6道,立耳下部饰辫索纹,或7道或8道(四组)。腹部饰凸弦纹3道。平底微微向外凸出,其上有烟灸痕。器底及下腹部合范痕尤为清晰(系双合范铸造),上腹及器内壁上的合范痕迹均已被打磨。器内底有阳文汉隶“延光元季朱提作”7字铭。器通高(含立耳)23.5、口径23.8、底径23厘米。铜色偏黄,器颇厚实,腹部一道几乎贯通的早年裂痕,余处保存较好。

铜洗,2件。一无沿、一无底,断口陈旧,均应为早年所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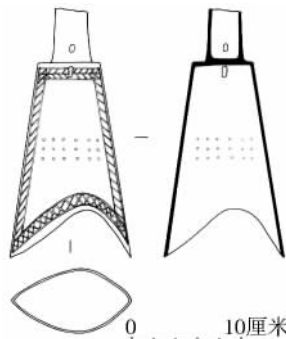
无沿铜洗,1件(暂编号08AX:2,图一,2)。口沿及部分腹不存,沿系早年断痕,腹部为新痕。圆鼓腹、平底。腹部饰凸弦纹5道,弦纹间饰对称铺首一对(环已不存)。器外底合范痕一道尤为清晰(系双合范铸造)。器内底凸饰双

鱼(鱼头同向),两鱼间有阳文汉隶“延熹四季朱提堂狼造”10字铭。器残高19.5、残口径40、底径16厘米。铜色偏黄。口沿部分疑系早年有意去除。

无底铜洗,1件(暂编号08AX:3,图一,3)。器底不存,系早年断痕,疑有意去除。敞口、折沿、斜腹微弧,平底。腹部饰凸弦纹4道,弦纹下饰对称双铺首,铺首铸作尤精,衔环已不存。器高18、口径35.5、底径18厘米。

铜盆,1件(暂编号08AX:4,图一,4)。口微侈,弧腹,平底外圈微凸,上有对称浅乳丁足4枚。通体无纹。口沿略开裂变形。器高13、口径28、底径16.5厘米。器壁较前述3器略薄,器底未见合范痕。

铜钲\*,3件(暂编号08AX:5~7,图一,5;图一,5-1)。形制相若,大小相仿,保存较好。以08AX:5为例,带柄合瓦(两瓦相合)形,两侧自上而下斜张。直柄扁圆形,中空,长5厘米,上设对穿长圆形二孔。平顶。钲身纵剖面略呈梯形,下底弧形内凹。横断面呈阔叶形。钲身上部近顶处有对称长方形二穿(3器中有1器该孔未对穿,仅钲身一面有孔)。钲身两面边缘有带状线形纹饰:上为叶脉形纹,下为连续x纹,两侧为斜线纹。钲身两面中部偏下各有短乳丁纹9枚。器通高23、底横长11、纵宽6厘米。



图一,5-1 (08AX:5)

羊角钮钟,1件(暂编号08AX:8,图一,6)。羊角形钮,钟身两侧自上至下斜张。圆弧形顶,下底平直,横断面呈阔叶形。钟身近顶处设对穿长方形孔一对,孔径4×1厘米。底端二侧有对称锯齿状装饰(各4齿)。器通高31、耳高5、下底横长18.5、纵宽14.5厘米。器颇厚实。

据现场施工人员回忆,出土时,3件铜钲被

※ 此器名称待考,今暂称其为“钲”。《说文》:“铎,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铎。”一般又称钲为大铎。又有称铎为执钟者。铎进一步演变,则成为钟。钟因纽的不同可分为甬钟(斜挂)和钮钟(直悬)。安龙此次所出者,器身已有类似于“枚”的装饰,似钲又似钟。据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西周晚期以后,甬钟流行地区甚广,在南方百越诸地则流行钲”之说称其为钲。也有人称此类器为“句鑃”,参见《贵州文物精华》第61页及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羊角钮钟套合，竖立放置。铜盆（08AX：4）放置于无底铜洗（08AX：3）内。

### 三、对新出文物的初步认识

以上8器据其特征与来源似可分作三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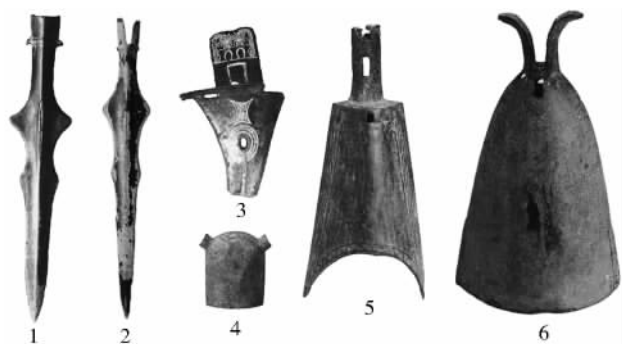
第一组，朱提、堂狼铜器，4件。08AX：1~3，系典型的朱提堂狼铜器，前两器已有铭文为证。编号为08AX的铜洗，器底无存，但从器形看，其为朱提堂狼洗无疑。08AX：4，较前述3器略有区别，但将之归为朱提堂狼器应大致不误。

朱提堂狼铜器，系东汉时产自云南朱提、堂狼的铜器。自宋代开始，便已有人收集和著录，清代尤甚，仅罗振玉、容庚两家著述内便收录朱提堂狼铭文铜器54件。习惯上称其为“朱提堂狼洗”，实际上不尽为洗，尚有釜、釜、釜、盘等类。目前传世和出土的朱提堂狼铜器，铭文中年代最早者为“建初元年（公元76年）堂狼造”，最晚者系“建宁四年（171年）堂狼”。款识有以下6类：1）、纪年、铭文加“造作”，此类颇多，地名或单署朱提、堂狼，或并署；2）、有纪年、地名，无“造作”，较少；3）、有纪年而无地名者，多见；4）、纪年、地名加吉祥语，如大吉、吉羊等；5）、地名加吉祥语；6）无纪年、地名，仅有吉祥语，少见。朱提、堂狼，地在今滇东北昭通、会泽一带。当朱提、堂狼并署时，后者可能指的是山名<sup>[1]</sup>。安龙此次发现的带铭文的二器，一为“延光元季（122年）朱提作”铜釜，一为“延熹四季（161年）朱提堂狼造作”铜洗，其纪年均未见诸前引孙太初文。1976年兴义万屯曾出“永元二年（公元90年）堂狼造”铜洗1件<sup>[2]</sup>。此次发现的是贵州目前所见第二批、也是数量最多的一批带铭文的朱提堂狼铜器，弥足珍贵。



图二 青铜剑

1.T字形剑（安龙） 2.葫芦形扁茎剑（普定） 3、4.扁圆茎空首无格剑（安龙、丘北） 5~7.一字格曲刃剑（兴义、普安、安龙）



图三 青铜兵器、乐器

1~2.曲刃矛（兴义、安龙） 3.舞蹈纹戈（兴义） 4.管耳铜铃（望谟） 5.铜钲（兴义） 6.羊角钮钟（安龙德卧）

第二组，铜钲，3件。铜钲是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一种较为常见的乐器，分布较广，黄河、长江、淮河、珠江等流域均有发现。使用的人群，据研究有中原、吴、越、楚和巴等<sup>[3]</sup>。类似打击乐器此前在黔东南多处曾零星出土，如松桃（1962，鐸于5件、钲1件、甬钟1件）、铜仁（1984，鐸于1件）、正安（1996，甬钟1件；2001，鐸于1件）、岑巩（1998，甬钟1件）、务川（鱼纹铜洗2件、甬钟1件）<sup>[4]</sup>。因多与鐸于伴出，出自黔东南的此类器物可能源自巴地。而与安龙此次所发现的铜钲完全一致的器物，1987年曾在兴义出土2件，通高均29.5厘米<sup>[5]</sup>（图三，5）。此类铜钲，柄及钲身上部均设穿孔，应系便于悬挂而作，其使用方式可能与羊角钮钟同。黔西南出土的此类器物可能来自百越地区，也不排除其为土著遗物的可能性。

第三组，羊角钮钟，1件。包括此次发现者在内，贵州境内目前共发现羊角钮钟3件，均出自安龙境。1984年7月化力修路时于岩石夹缝中发现羊角钮钟1件，通高37厘米（图三，6）。1987年城南镇文昌宫旧址发现羊角钮钟1件，通高29.5厘米<sup>[6]</sup>。这类器物在中国南方的云南（23件）、广西（19件）、湖南（5件）、贵州（3件）、广东（1件）和越南北部（14件）均有发现<sup>[7]</sup>，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中也发现悬挂的羊角钮钟图像<sup>[8]</sup>。一般认为，其流行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晚期。从分布范围看，其使用民族可能为百越民族，也可能为百濮，或濮越均用。此次发现的羊角钮钟，器形厚重，一望即知其另两组7件铜器非产自一地。羊角钮钟的通高普遍在20~25厘


米之间,云南文物商店一件通高43厘米的羊角钮钟是目前所见最大的羊角钮钟<sup>[9]</sup>。贵州目前所发现的3器,通高分别为29.5、31、37厘米,属羊角钮钟中的较大者。

若以上分析大致不误,则安龙新安此次出土的8件铜器年代不同,来源不一:羊角钮钟、铜钲的年代偏早,可能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本地土著遗物,也可能源自百越地区;而朱提堂狼铜器为东汉晚期遗物,来自滇东北。这种情况反映了文化的交流,并进一步验证了文物出土地点为窖藏的可能性。但因现场的破坏,目前已无法推知埋藏的年代,仅知其不能早于公元161年。



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埋葬,这批器物本身因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而弥足珍贵。我们可据此推断一批青铜器的来源,如与08AX:1造型相同的铜釜兴仁交乐汉墓曾有出土<sup>[10]</sup>,该器虽无铭文,但由安龙所出带铭文器可推知其应为朱提堂狼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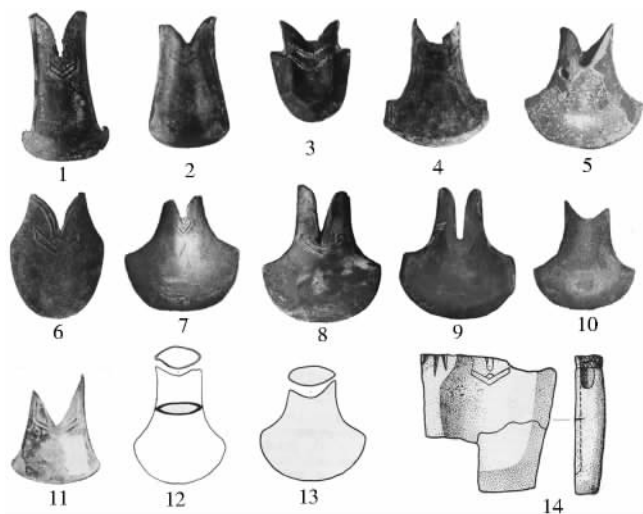
#### 四、贵州西南地区青铜文化检视

前述三组铜器中羊角钮钟、铜钲既可能为本地遗物,也可能系外来物,不能明确来源,这引发一个问题,即对贵州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问题。贵州西南东接望谟、西至盘县、北抵普定、南跨兴义、册亨一带的南、北盘江流域内,历史上曾不断有零星青铜器出土(部分为发掘品),据不完全统计,已逾百件(参见附表),集中分布在安龙、兴义和普安三地。经调查,已在普安、安龙、兴义三地发现山顶遗址19处<sup>[11]</sup>,并对其中的铜鼓山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sup>[12]</sup>。这类遗址的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另近年在北盘江两岸阶地上发现史前至汉代遗址16处,并对其中11处进行了清理<sup>[13]</sup>,其中相当部分为先秦时期遗址,部分属汉晋时期。

百余件青铜器可分兵器、乐器、农具、工具、装饰品诸类,而以兵器和乐器为多。兵器约30件,含无胡戈4件,其中2件饰有人物图案(图三,3);铜剑8件,其中一字格曲刃剑5件、T字形剑1件、葫芦形扁茎剑1件、扁圆茎空首无格剑1件(图二);铜钺约13件,其中V形釜、带符号的铜钺10件(图四);铜矛5件,

其中曲刃矛3件(图三,1、2)。乐器63件,含铜铃55件、铜钲5件、羊角钮钟3件(图三)。农具有铜锄约4件,其中尖叶形锄3件,长条形锄1件。

以上多数器物均可在周邻地区找到可资对比的同类器,其中的羊角钮钟、一字格青铜剑、舞蹈纹铜戈、尖叶形铜锄、铜铃等尤其如此。如前所述,羊角钮钟广见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和越南诸地,而以云南、越南的沅江——红河流域,贵州、广西南、北盘江——西江流域的分布最为集中。曲靖、昭通、威宁、赫章一带迄未发现。三人联手舞蹈纹铜戈在云南、贵州、四川<sup>[14]</sup>和越南<sup>[15]</sup>均有发现,其中以云南发现的数量最多,是滇文化的典型器之一,滇东南麻栗坡、泸西<sup>[19]</sup>等地也有分布,贵州以赫章可乐的发现数量最多,桂西北地区目前尚未见报道。一字格剑在云南、贵州、广西<sup>[16]</sup>、湖南<sup>[17]</sup>和越南<sup>[18]</sup>均有发现,此器亦是滇文化中最常见的器物之一,贵州境内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地区,广西主要发现于右江流域。然而从形态上看,黔西南、桂西北和滇东南泸西、麻栗坡<sup>[20]</sup>等地发现的一字格剑较为接近,其与滇池周边发现的同类器略有区别:滇池周边发现的一字格剑剑身修长,带曲刃者不多;而三省交界处发现的一字格剑,应为一字格曲刃剑,剑身短宽,曲刃幅度较大(图二,5~7)。尖叶形铜锄在整个黔西、广西右江流域和云南均有分布,形制差异不大,不赘述。风字形钺身、V形釜、部分带符号的铜钺,目前仅发现于黔西南、滇东南富宁、麻栗坡<sup>[21]</sup>和桂西北右江流域<sup>[22]</sup>,越南<sup>[23]</sup>也有零星发现(图四)。这是该区域最频见、最具特征的典型器物。其中带符号的铜钺除贵州发现10件外,右江流域的百色、田东和武鸣三地至少发现4件<sup>[24]</sup>。此外安龙龙广出土的扁圆茎空首无格铜剑,与之类似者在云南丘北曾出1柄,剑身微有差异,剑茎及其纹饰如出一辙<sup>[25]</sup>(图二,3、4)。贵州西南地区也有使用铜鼓的线索,1958年兴义巴结村民曾在街上挖出1件带双耳、细腰、敞口的铜罐,实物已流失,据其描述疑系铜鼓<sup>[26]</sup>。而早期铜鼓在滇东南、桂西北右江流域已有较多发现<sup>[27]</sup>。目前T字形青铜剑、葫



图四 青铜钺、钺范

1~3、5~8.铜钺(贵州普安铜鼓山、兴义) 10.铜钺(越南) 4、5、7、10、11.铜钺(广西武鸣、百色、平塘) 10.铜钺(越南) 12、13.铜钺(云南麻栗坡、富宁) 14.石钺范(贵州普安铜鼓山)

芦形扁茎铜剑等少量器物尚未发现可对比资料,似系贵州西南所独有(图二、1.)。该地发现的曲刃铜矛也颇具特色(图三,1、2)。

通过以上简单对比可以看到,贵州西南地区与其周邻桂西北、滇东南的联系至为密切,远甚于其与黔西北地区文化联系,可能存在一个包括黔西南兴义、安龙、普安、册亨、望谟等与滇东南丘北、广南、富宁及桂西北右江上游百色、田阳、田东等地区在内的一个文化圈。该文化圈内一字格曲刃、舞蹈纹无胡铜戈、曲刃矛、V形釜带“V”符号的铜钺、羊角钮钟、铜鼓等流行,而风字形钺身、V形釜、部分带“V”符号的铜钺是该文化圈内最为频见、最具特色,也是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的关键。从目前的材料看,该文化圈似是以南北盘江包围中的贵州西南地区为中心的,而普安铜鼓山遗址先后出土的用于铸造V形釜、带“V”符号铜钺的石范、以及铸造曲刃矛或剑的石范、一字格曲刃剑茎模、舞蹈和“胡桃纹”图案铜戈石模,以及铃范等,则表明该文化圈内所流行的多数青铜器均为当地所造<sup>[28]</sup>(图四,14;图五)。该文化圈西与曲靖境内“滇文化八塔台——横大路类型”<sup>[29]</sup>在内的滇文化相接,东南右江流域则有百越文化的西向渗透。有论者指出广西右江流域青铜文化处在滇、越文化的过渡地带,二者彼此交融碰撞,产生出

亦此亦彼的文化现象<sup>[30]</sup>。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贵州西南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圈的特点,但未突出其独有的特征。前已叙及,该文化圈内流行的绝大多数器物为当地所造,当一类器物被一个族群所采用并自行铸造时,它便已成为其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如铜鼓在中国南方的使用。概况起来看,该文化圈是以风字形钺身、V形釜、部分带“V”符号的铜钺为典型器物,使用并铸造一字格曲刃剑、曲刃矛、舞蹈纹无胡铜戈、铜铃等,同时流行羊角钮钟、铜钲、铜鼓、尖叶形铜锄等器的一类青铜文化。

该文化圈内,目前普安铜鼓山遗址的工作做的相对深入,可以之为代表,暂称其为铜鼓山类遗存。



从目前的材料看,铜鼓山遗址的陶器受到了红水河流域自史前以降的陶器传统的影响,流行高领侈口圜底陶器。近年来我们在北盘江流域发现16处史前至汉代的遗存,并对其中11处进行了发掘。目前对该流域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还缺乏深入认识,但粗略来看,虽各有差异,但基本以双肩石器和圜底陶器为特点。这与其下游广西红水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致的<sup>[31]</sup>,与广西部分先秦岩洞葬也存有较多相似性<sup>[32]</sup>。北盘江流域所见磨制石器分有肩和无肩两类,有肩石器中以广肩半月形身和不对称形两类石斧最具特色也最为常见。陶器以夹砂圜底器为主,另有少量圈足、三足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刻划纹、附加堆纹、方格纹、戳印纹等。器形以束颈侈口圜底罐、直口高领圜底罐、侈口高领圜底罐、钵较为常见。北盘江岸目前已发掘的遗址中可确定为先秦时期的铜器极少。以铜鼓山为代表





图五 贵州普安铜鼓山出土石模及同类实物对比图

1.舞蹈纹戈模(铜鼓山) 2.“胡桃纹”戈模(铜鼓山) 3.铜戈(贵州兴义) 4、5.一字格剑茎模(铜鼓山) 6.一字格曲刃剑茎部(贵州安龙)

这类山顶遗址延续了北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圜底陶器作风,并以之为主,次为圈足器,也有少量平底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高领敞口圜底罐和高领侈口圜底罐最多。而石器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铜鼓山类遗存中目前未发现双肩石器,而北盘江流域未出的穿孔石刀在铜鼓山类遗存中则较为常见。这种差异可能与时代早晚有关,也可能是不同的生业方式使然<sup>[33]</sup>。共同的圜底陶器传统表明以铜鼓山为代表的这类山顶遗址和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先秦阶地(洞穴)遗址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在讨论贵州西南地区青铜文化时不能不考虑这一情况。

综上所述,贵州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与相邻桂西北、滇东南地区的铜器文化联系密切,可能存在一个以风字形钺身、V形釜、部分带符号的铜钺为典型器物文化圈。该文化圈内普安铜鼓山遗址的工作相对深入,可以之为代表暂称之为普安铜鼓山类遗存。这类遗存的特点,反映在青铜器上,以使用并铸造V形釜铜钺、一字格曲刃剑、曲刃铜矛、舞蹈纹铜戈等为特点,同时流行羊角钮钟、铜钲、铜鼓等;陶器则以高领圜底器为传统。它处在滇、越文化的过渡地带,受到了西面滇文化和东南面百越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有一些风格独特的器物,如风字形钺身、V形釜、部分带符号的铜钺、T字形青铜剑、葫芦形扁茎青铜剑等,使该类遗存有别于其他遗存。目前对该类遗存的认识如具体分布范围、年代序列、完整内涵以及族属等,因材料限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 五、结语

从贵州安龙新出铜器入手,我们简单梳理了贵州西南地区历年出土青铜器,并将之与周邻材料比对后发现,黔西南、桂西北、滇东南地区存在一个以风字形钺身、V形釜、部分带符号的铜钺为典型器物的文化圈。该文化圈以南北盘江流域的贵州西南为中心,以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暂称之为铜鼓山类遗存。其特点反映在陶器上,是以圜底器为传统,青铜器则以使用并铸造风字形钺身、V形釜铜钺(部分带符号)、一字格曲刃剑、曲刃铜矛、舞蹈纹铜戈等,

同时流行羊角钮钟、铜钲、铜鼓等为特点。其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安龙新安新出的羊角钮钟与铜钲均为当地土著遗物。

铜鼓山类遗存与其西面的滇文化、东南面的百越文化有着密切的文化往来,这种联系甚至可以上溯至史前时期并一直绵延于后。西汉以降,随武帝开发西南夷并在该地区人口密集之处设立郡县,汉文化大量涌入。从考古发现反映的情况看,东汉时黔西南兴义万屯——兴仁交乐一线人烟稠密,并有大量汉式风格的墓葬出现,交乐M14内发现的“巴郡守丞”印即表明该地汉墓级别较高<sup>[34]</sup>。从现有材料分析,该地在东汉时期至少为县一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这一时期,大量业已商品化的朱提堂狼铜器通过既有的文化通道不断流入,则完全可以理解。除此次安龙新安所出的带铭文器物外,兴仁交乐、万屯汉墓中还存在一批无铭文但可确定的朱提堂狼铜器<sup>[35]</sup>。

囿于现行行政区划的束缚,学者往往以各自所处的行政区为限,舍近求远地寻求同一行政区内的古代文化的联系而忽略相邻地区的他省材料。从威宁中水到普安铜鼓山的研究,均存在这种情况。以威宁中水银子坛类遗存为例,该类遗存广泛分布在昭鲁盆地和威宁中水境内,却出现在黔者为夜郎遗存、在滇者为滇文化遗存的不同认识。我们认为,在研究古代文化遗存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时,应尊重事实,率先考虑地理环境与地理单元而非行政区划,从考古学的角度厘清一类遗存的分布、内涵、时代、谱系等基本要素,再运用结合文献等方法展开研究,否则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是不足信的。从目前的材料看,贵州境内以往视为夜郎遗存代表的普安铜鼓山、威宁中水、赫章可乐三遗址之间,存有一些共性,但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可能分别代表了各自不同区域内的某类遗存,而这与两汉文献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的状况是相吻合的。

注释:

[1] a.孙太初:《朱提堂狼铜洗考》,《云南青铜器论丛》178~19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b.汪宁生:

《云南考古》，《汪宁生论著萃编》（下卷）1136~1142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2] 参见《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待刊）。

[3] 高至喜：《两周铜钲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4] 李飞：《贵州战国秦汉考古》，《“三普”贵州考古调查指导手册·第三章》（编纂中）。

[5] 黔西南自治州人民政府编：《黔西南文物精华》22页（内部发行）。又见《贵州文物精华》6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6] a.胡维屏、李志恩：《我省首次发现羊角钮钟》，《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58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b.《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文物出版社2000年。

[7][9] 袁华韬：《羊角钮钟若干问题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8] 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广西左江岩画》20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 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图十四：4，《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5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11] 综合《贵州省志·文物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待刊）。其中普安11处、安龙6处、兴义2处。

[12] 前两次（1979年、1980年）的发掘材料参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三次发掘（2001年）的材料参见《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13] 计有罗甸羊里、洒亭、贞丰鲁容孔明坟、沙坝、白层观音洞、坡门、天生桥、坝油、鲁贡拉它、浪更燃山、坝若、者相小河口、坡扒阁卡地、镇宁良田田脚、望谟乐元水打田、关岭新铺晒板龙等16处遗址。资料正在整理中。

[14] 《四川简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15][18] [越]黎文兰等编著、梁志明译：《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年。

[16] a.覃芳：《广西先秦时期的青铜剑》，《广西考古文集（二）》，文物出版社2006年。b.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广西考古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7年。

[17] 据2008年11月昆明第五届西部考古协作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成先生所作《湖南发现的两件异形青铜兵器》的报告，一字格曲刃铜剑目前湖南发现1件，可能源自广西。

[19] 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8年。

[20] 同[19] 52页、73页、90页，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

[21] 同[19] 45页、48页，这类铜钲目前在麻栗坡、富宁两县共发现2件。

[22] 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广西考古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7年。

[23] 作者2006年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参观“越南青铜文化展”所见，仅1件。

[24] 同[22]，另见《广西先秦岩洞葬》的武鸣独山岩洞葬发掘材料，亦见《文物》1988年第12期。

[25] 同[19] 图版三十六.3。

[26] 何凤桐：《贵州境盘江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存》，《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89页。

[27] a.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万家坝型铜鼓》，《考古学报》2007年2期；b.蒋廷瑜：《广西古代铜鼓》，《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28] 同[12]。需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发掘的编号为T13：2：2的剑茎模，经仔细比对，其为一字格剑剑模无疑。另一件大小相若的剑茎模（T57：2：5），目前未发现与之纹饰相同的青铜器实物，但从其形制和尺寸判断，也应为一字格剑剑模。带人物图案的戈模2001年第三次发掘时曾出土2件。

[2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

[30]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31] 林强、谢广维：《广西红水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和研究》，《广西考古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7年。






[32] 有肩石器、直口圜底罐、直口圜底三足罐等，在红水河流域的广西先秦岩洞葬中较为常见，参见《广西先秦岩洞葬》。贵州贞丰鲁容沙坝遗址出土的直口圜底罐、镂空圈足器、三足器、水波形刻划纹与附加堆纹，贞丰鲁贡拉它遗址的附加堆纹等，均可在广西先秦岩洞葬中找到类似者。

[33] 网坠在北盘江流域各时期的遗存中较为广见，可能表明渔猎长期是其重要的生业形式。

[34] 两地早期发掘资料参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较近的资料参见《贵州兴仁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35] 明确的有万屯早年出土的“永元二年（公元90）堂狼造”铜洗。另王燕子《交乐汉墓出土铜器补》一文中的“立耳铜釜”、万屯M7、M8内所出的饰鱼铜洗等，均可能为朱提堂狼器，参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

附表：贵州西南部历年出土东汉以前重要青铜器一览表  
(按发现时间排列)

序号	器名	数量 (件)	出土地点	出土 / 征集时间	资料来源
1	钁、锄	2	盘县沙陀征集	1955 年	宋世坤《贵州考古论文集》P86, 钁为尖叶形, 锄为长条形
2	钁、钺、斧	5	兴义供销社拣选	1975 年	同上
3	舌形斧	1	兴仁土产站	1977 年	李衍垣《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P147
4	戈	1	晴隆征集	1979 年	同上
5	铎	1	普安铜鼓山出土	同上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62, 原文作“钺”
6	削、刀	13	普安铜鼓山出土	1979 年 (1 件)、 1980 年 (12 件)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62、79
7	一字格曲刃剑	1	普安铜鼓山出土	1980 年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79
8	矛	1	安龙龙广镇簸箕寨	1982 年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290
9	铃	1	兴仁龙场镇三道沟村田坝寨	同上	《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
10	钺	3	兴义顶效、下午屯	同上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283 其中 2 件带  符号
11	船形钺	1	兴义巴结镇中心村者安组	同上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289 原文作“斧”
12	钺	1	同上	同上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289 带  符号
13	钺	1	兴义下午屯镇下纳灰村, 营盘山	同上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289
14	一字格曲刃剑	1	安龙新安镇元宝山村昭堤寨, 魁星山洞	1983 年	《贵州文物工作》2002 年 3-4 期 P114
15	戈	3	兴义威舍镇光辉村土坝子中	1986 年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281
16	羊角钮钟	1	安龙德卧镇停西村木科寨	1987 年	同上
17	羊角钮钟	1	安龙新安镇文昌宫旧址	同上	《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
18	钲	2	兴义万屯镇佐舍村	同上	《黔西南文物精华》P22
19	钺	1	普安楼下镇	1988 年	《黔西南文物精华》P20 带  符号
20	矛	1	安龙新安镇么唐村	1991 年 9 月	《贵州文物工作》2002 年 3-4 期 P114
21	曲刃矛	1	兴义马岭镇龙井村岩隙中	1993 年	《黔西南文物精华》P21
22	铃	54	望谟石屯镇巧散村白岩坡	1996 年	《夜郎研究》
23	镯	10	同上	同上	同上
24	飞鸟	1	同上	同上	同上
25	一字格曲刃剑	1	兴义郑屯镇光辉村乱石中	1997 年	《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 《黔西南文物精华》P19 图
26	一字格曲刃剑	1	兴义顶效镇绿荫村大寨后山	同上	《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 《黔西南文物精华》P19 图
27	葫芦形扁茎剑	1	普定雄家林寨	1998 年	《贵州文物精华》P38
28	曲刃矛	1	安龙龙广镇板拉村	1999 年	同上, 另见《贵州文物精华》P46, 但误作兴义所出
29	曲刃矛	1	兴义顶效镇那叠村新寨组, 乱石中	同上	《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
30	T 字形剑	1	安龙龙广七星村碑塘组, 田坝石隙	同上	《贵州文物工作》2002 年 3-4 期 P114, 《贵州文物精华》P39
31	一字格曲刃剑	1	安龙龙广镇板拉村	同上	《贵州文物工作》2002 年 3-4 期 P114
32	扁圆茎空首无格剑	1	安龙龙广七星村碑塘组, 田坝石隙	同上	《贵州文物工作》2002 年 3-4 期 P114, 《贵州文物精华》P38
33	钺	5	普安铜鼓山出土	1980 年 (3 件) 2001 年 (2 件)	《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P79, 《贵州文物精华》P43-4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2》, 均带  符号
34	钺	1	册亨坡妹征集	2000 年	彭龙提供, 带  符号
35	尖叶形锄	1	普安铜鼓山出土	2001 年	《贵州文物精华》P47
36	钲	3	安龙新安镇大坪村田间	2008 年	本文
37	羊角钮钟	1	同上	同上	同上
总计 :127 件					